



明清江南 私人刻书史略

■ 叶树声 余敏辉 著

■ 安徽大学出版社

校
書

書

校
書

刻
書

本书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

叶树声 余敏辉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叶树声,余敏辉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5
ISBN 7-81052-330-9

I. 明… II. ①叶…②余… III. 木版水印-历史-中国-江南(历史地名)-明清时代 IV.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793 号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

叶树声 余敏辉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6428	开本	850×1168 1/32
	总编室 0551-5107719	印张	7.2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字数	180 千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版次	2000年5月第1版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印次	2000年5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数	0001—2000

ISBN 7-81052-330-9/K·29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次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兴起背景	(5)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5)
第二节 科学、文化、教育因素	(10)
第三节 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	(16)
第四节 优越的私刻条件	(18)
第三章 明代江南私人刻书概况	(20)
第一节 雕版印书	(20)
第二节 活字印书	(87)
第三节 手工抄书	(91)
第四章 清代江南私人刻书概况	(96)
第一节 雕版印书	(96)
第二节 活字印书	(120)
第三节 手工抄书	(123)
第四节 石印和铅印	(128)
第五章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主要特点	(135)
第一节 内容方面	(135)
第二节 形式方面	(138)
第三节 版本方面	(141)

第六章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主要贡献	(145)
第一节	保存文献,传播文化	(145)
第二节	积累丰富的刻印经验	(149)
第三节	积累宝贵的校书经验	(151)
第四节	促进本地区版画艺术的发展	(161)
第五节	促进本地区藏书事业的发展	(165)
第六节	促进本地区丛书编辑工作	(171)
第七节	促进本地区目录编制工作	(176)
第八节	促进本地区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180)
第九节	缺点	(184)
第七章	余 论	(187)
附录一	论清儒辑佚	(191)
附录二	论清儒辨伪	(204)
附录三	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	(218)

第一章 绪 论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我国雕版印刷源于中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明、清两代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其刻书盛况,远超宋、元,更为唐代所不及。我国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中央和地方各部门主持或付帑雕书,谓之官刻;个人主持或出资梓书,叫做私刻。私刻主要包括坊刻、家刻、塾刻等形式。明、清两代私人刻书甚为普遍,私人刻家分布很广,犹如天上的繁星布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而以江南地区为多;在江南,则以今日华东地区所属部分为最多。这是因为该地区自古以来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文教发达。这些因素既为这一地区私人刻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又为其图书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明、清两代江南私人刻家之多,刊书之众,技术之高,印品之精,影响之大,皆是该地区宋、元诸代所无与伦比的,也是同时期其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明、清两代江南私人刻书者有数百家之多,并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刻书中心。明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明万历年间另一学者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也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闽建(今福建建宁)有书坊,出书最多。”胡、谢两学者皆为明人,耳闻目睹,所论有据。他们虽是评价明代私人刻书质量,却也道出了明代私人刻书的主要地点。这些主要地点均处长江以南。当今学者也多同意此论。今

人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下称《常谈》)一书中说:“明版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地。”时至清代,除闽建外,其余几个刻书中心依然繁盛。清学者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说:“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廓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清另一学者金埴《不下带编》卷四说:“今闽本书久绝矣,惟白下(金陵)、吴门(苏常)、西泠(杭州)三地书行于世。”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下称《提要》)指出:“至于刻书地点,清初则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最多最好。”明、清两代江苏有苏、常和金陵两大刻书中心。前者包括苏州、常州、无锡、松江等地区。浙之刻书中心主要有杭州和湖州两处,同时分别包括各自的临近地区。皖之刻书中心在徽州(今歙县),包括皖南其他地区。明时闽之刻书中心在建宁,包括建阳、建安等地。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我国北宋庆历年间的毕升,他所用的是胶泥活字。进入元代,皇庆年间的王桢创造木活字印书成功,把活字印刷术又推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印刷实践活动都是在江南地区进行的。前者在浙之杭州,后者在皖之旌德,这是与宋、元时期该地区私人刻书的普及分不开的。

用金属活字印书,被认为是印刷术的一大发展。明中叶,该地区苏、常、金陵、浙江、闽建等地皆有用铜活字印书之事,尤以苏、常地区盛行。无锡华、安两姓铜活字印书在版刻界享有盛誉。除铜活字印书外,这里在明时还有铅活字和锡活字印。该地区清时用金属活字印书也较为普遍,并为引进近代铅印技术创造了条件。

用泥活字印书成功,意义尤为深远。清道光年间李瑶在杭州用胶泥活字成功地排印了《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两种书。与此同时,皖南泾县翟金生经30年之努力,制泥活字10万多个,并按毕升之法,“火烧令坚”,于道光年间用其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等几种书。他们俩人按毕升之法,用泥活字印书成功,雄辩地说明了毕升

之法是可行的，毕升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同时也有有力地批驳了当时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毕氏之法不可靠，德国谷腾堡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一论调。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除用金属活字和泥活字印书外，还用木活字印书，使王祯的木活字印法得到了应用和发展。清时徽人程伟元在外地先后两次用木活字排印了《红楼梦》一书，被分别称为“程甲本”和“程乙本”，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

套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古代印刷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这项技术也是该地区名工发明的，又是首先在这里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的。明时徽州名工起先用涂版的方法印出不同颜色的花卉，进而程大约用套版法印出了多色的《程氏墨苑》。使用此法最多的要数浙之乌程凌、闵两家。他们套印的书籍达 100 多种，名扬中外。金陵名工采用此法又有创新。他们在原套印法基础上，又发明了“短版”和“拱花”技法，使套印技术更臻完善。“短版”和“拱花”的发明，是对套印技术的一大贡献。吴法祥和“十竹斋”分别用此法印造的《笥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书画谱》等书，是有口皆碑的佳品。此法以后经过不断翻新，今日仍在采用。

该地区明、清时期印刷技术之所以能领先于其他地区，主要原因之一是有一支技术熟练的刻工队伍。他们为数众多，仅苏、常地区在明中期就有刻工 600 多人，徽州黄氏一门就有 300 多名。他们能刻善印，不仅能刊刻出质优的书籍，也能雕印出精美的画图。明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说，明时“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他们于明、清两代在该地区操刀刻书数以万计人次，镌画数以万计幅次。苏之常熟“汲古阁”一家就刻书 604 种（以单书计算，下同），明金陵“富春堂”一坊镌画就有 1000 多幅。正因为明时江南地区所梓版画数量庞大，且风格不一，便形成了新安、金陵、建安三大派别，使我国明代版画在世界版画史上“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鲁迅《木刻纪程·小引》），其中新安、金陵两派版

画至清季仍方兴未艾。在其影响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于清后期又异军突起，显赫一时。

明、清时期江南不仅刻书盛行，抄书也盛行。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下称《史略》）一书统计，明、清两代江、浙抄书家有 100 多人。其中江苏的抄书家也多属于江南。“汲古阁”毛氏影宋抄本世称精绝，被誉为“毛抄”。清代武林劳格兄弟抄书也很精，被称为“劳抄”。长洲朱存理抄书与众又有不同。他除翻抄外，还进行辑抄。他抄的《铁网珊瑚》，很为世人称道。时至近代，以石印和铅印为主体的近代印刷术传入我国，当时称之为新式印法。由于该地区原来印刷基础较好，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技术很快在这里得到推广。当时全国采用新式印法的有 100 多家，而该地区就占 70 多家。其中尤以上海为多，到 1911 年，这里已有 60 多家采用新式印法。用新式印法印书较多的是苏州的“扫叶山房”、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点石斋”几家，所印书在当时颇有影响。

通过上面的简要叙述便不难看出，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私人刻书在中国出版事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认真研究明、清两代该地区私人刻书的成就，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和推动今日出版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兴起背景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深知人民力量的伟大。元代来去匆匆的历史教训，他不得不吸取。他刚定都金陵，就采取了与民休息政策。他说“恣意奢侈，使百姓困乏”，就将“至于亡乱”（《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他反复告诫儿孙和臣僚，要“取之有制，用之有节”，若置百姓死活于不顾，横征暴敛，就如同骑士“急銜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明太祖实录》卷七六）他建都金陵后，为了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整顿和维护社会秩序，他建立了“黄册、鱼鳞册”户籍制度和“里甲”乡村管理制度，使百姓停止逃乱，开始稳定下来。他针对“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的状况，实行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菜）二亩，免租三年”，并规定“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到洪武七年仅7年时间，全国共垦荒地921124顷（《明太祖实录》卷九五）。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兴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堰40987处（《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羨，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明初期在发展民间工商业方面，政策较元时有所放宽。例如采矿，明初取消了限制百姓开采铁矿的禁令，“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在税收方面，较元时有所减轻，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洪武十三年，政府又下令“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其结果，使明代前期社会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江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和劳动力充足等因素，社会经济更显繁荣。苏州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明张瀚《东窗梦语》说：“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纴，而三吴为最。”松江“所出布匹，日以万计”，“远近流通”（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一）。这里的商业经济也很繁荣。当时全国较大的商城有40余座，其中以京师金陵数一数二，城内商店林立，百货云集，“塌房”（堆放货物的地方）遍布大街小巷。苏州、松江、徽州、扬州、杭州、建宁也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市。苏州、松江主要是纺织品集散地。值得一提的是徽州。据《歙县志》记载，当时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的经济活跃地区，徽贾足迹“几遍宇内”，故有“天下无商不徽”之说。建宁书肆比较繁荣，建阳更为突出。据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是这里刻书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从明中叶开始，这里私人刻书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到了明末，战乱时有，社会不宁，社会经济遭到了破坏，私人刻书也因之受到影响。如明末常熟著名出版家毛晋父子在崇祯年间已将《十七史》书板雕成，因战乱未能合印，颇有损失，直到清顺治庚子方修补完，乃刊行。明末私人刻书业已不如明中期繁盛。

清代初期，战事依然频繁，社会很不安定，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江南地区也未能幸免。在江南各省，清军先后对南明政权和农民抗清斗争的镇压达10多年之久。“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皇清奏议》卷一五）。据《清实录》等材料所载，明末全国耕地面积有7

亿亩,清顺治末年(1661年)仅有5.2亿亩。华东江南一向人口稠密、土地高度集中的江苏宜兴地区,清初也是“荒田连陌千顷,其多者以里数计”(《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八)。“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十室九空”(《皇清奏议》卷一四)。顺治二年,嘉定、江阴、宁国、松江、吴县等地为反对剃发,遭清军血腥镇压。仅嘉定一地在一个月半月内被屠杀3次,被害者达2万人,历史上称之为“嘉定三屠”。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人民生命与财产都没有安全保障,私人刻书业也就谈不上恢复和发展。

清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必须设法缓和民族矛盾,恢复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农业方面,政府鼓励农民垦荒,并实行了“更名地”和“垦荒令”。因战乱所致,有些土地变成了无主荒地。政府便“招民开垦”,或要求士兵垦荒。顺治元年八月,政府将“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清世祖实录》卷七),这便是“更名地”。顺治六年四月,政府又颁布了“垦荒令”,“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二年又进一步规定,“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清圣祖实录》卷一零八)。康熙对垦荒纳税政策一再放宽,康熙十年规定垦荒4年起科,十一年又规定6年起科,十二年又放宽至“十年方行起科”(《清朝文献通考·田赋二》)。对推行“垦荒令”有成绩的各级官吏,政府也给予奖励。顺治十四年四月规定,如“按一年内……州、县垦至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清世祖实录》卷一零九)。“更名地”和“垦荒令”推行的结果,使清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增长很快。据《清实录》载: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亿亩,康熙二十五年增长到5.9亿亩,雍正二年增长到8.9亿亩。据《清史稿·食货志一》载: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为1920多万,乾隆二十九年增加到2亿550多万。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增长,为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清政府也大修水利。首先是对黄河、淮河、

运河以及洪泽湖进行治理。因为这些河湖在明末年久失修,有些地段经常泛滥,对生产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清时在南方修建了不少堤堰和塘池,如在苏州境内修建了从金山至杭县全长 248 里的“鱼鳞石塘”。

清时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至乾隆时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清初,政府也很重视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他们改变了赋税方式。明中叶以来,按“匠籍”向匠户收银,叫“班匠银”。康熙执政时,于三年下令,“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此后,又将“班匠银”摊入地亩征收,“匠籍”也就随之废除。同时还废除了拉工匠义务当官差的规定。雍正二年,下令“将设立总甲,出票官买,派工侍候,严行禁止”(《清朝文献通考·职役三》)。乾隆年间又多次重申这一禁令。废除“匠籍”和禁止当官差以后,工匠人身较以前自由,其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地方手工业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发展很快。乾隆末年,江宁民营丝织业就拥有织机 3 万多张,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织业中心。这里出产的“江绸”、“贡缎”质地优良,驰誉全国,当时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甘福《白下琐言》)。苏、杭二州这时生产规模虽不及江宁之大,但也还是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当时苏州城东“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乾隆《长洲县志》卷一六)。杭州也是“机杼之声,比户相闻”(《东城杂记》卷下)。松江则是当时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这里“秋成之后,家家纺织”。所产线绫、三绫布、漆纱等,被誉为“天下第一”棉织品。江南制瓷业也很发达,当时景德镇烧瓷民窑达 300 座,“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道光《浮梁县志》卷八),其繁荣程度皆远超明代。

康、乾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很快繁荣起来。江南地区因交通便利、工业发达、人口稠密,商业更显繁荣。江宁城内商贾云集,大宗贸易比比皆是。苏州在乾隆时已是拥有“十万烟火”的大都会,其财富“甲于天下”,城里“洋货、皮货、绸缎……诸

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杭州也是“百货所聚”，其繁荣程度不下苏州，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另外，镇江、无锡等也都是著名的商城。当时这里的出口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主要出口瓷器、丝织品、棉织品、茶叶等。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包括刻书在内的手工业的发展。

私人刻书有不少是带有经商性质的，如书坊刻书就是这样。明初朱元璋不仅重视官刻，也重视私雕，并实行了特殊的税收政策，以鼓励民间刻书。他刚定都金陵，就于“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为私人刻书减轻了税收负担。对于包括刻书工人在内的手工工匠，根据其住处距京师远近，分别实行了“轮班”和“住坐”两种为政府服役的制度。后来又规定，工匠若不愿服役，也可交银代之，谓之“班匠银”。与元代相比，这种政策有所放宽，工匠人身也略显自由一些。明中叶该地区私人刻书业能恢复和发展起来是与此有着一定关系的。但是到明中后期，官府除定期向工匠收“班匠银”外，还可以随时按匠籍加派官工、勒索财物，使工匠在经济上承受不了，他们经常逃避，因而手工业生产受到影响。刻书业也不例外。

时至清初，政府对税收进行了改革。明末清初工匠因税逃避，使政府“班匠银”欲收无着。据乾隆年间《平湖县志·食货上》载：清初浙之平湖县匠户，“或人户逃亡，鬼名空寄，以致征解无从”。乾隆年间《震泽县志·班匠银》也载：清初苏之震泽，“明季原匠子孙，逃故无追，悬额如故”。为保住“班匠银”这项收入，康熙政府将其改为按地亩征收。这样做，不仅使官府税收有了保障，也减轻了手工工匠的纳税负担，同时官府对手工工匠的人身控制也大为削弱，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康熙执政时，手工业很快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私人刻书业作为手工业的一种，也很快发展起来，江南地区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节 科学、文化、教育因素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仅工农业生产发达,科学研究也相当活跃,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们撰写了很多科技著作。这些著作内容广泛,包括手工业、农业、医学、天算、水利等诸多方面。明代主要有奉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松江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江阴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吴县黄省曾的《稻品》、《养鱼经》,徽州汪机的《外科理例》等。清代主要有宣城梅文鼎历学专著《古今历法通考》等,数学专著《环 R 黍 R》、《授时平定三差说》等。在收入阮元《畴人传》的《梅文鼎传》中,钱大昕称梅为“国朝(清)算学第一”。吴江王锡阐的《晓庵新法》,在天文历算方面,见解独到,自成一家。梅文鼎在《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中评价说:“近代历学以吴江(王锡阐)为最。”另外还有:梅文鼎孙子梅谷成主编的《律历渊源》,秀水曹溶的《倦圃蒔植记》,吴江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吴县王维德的《外科证治全生集》,等等。社会科学著作主要有清余姚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清昆山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清时这里目录考据之学大兴,编出了很多有影响的目录学著作。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补修史志,二是编制私人藏书目录。如杭世骏重编的《金史》,卢文弨撰的《宋史艺文志补》等,钱大昕撰的《元史艺文志》,吴騫撰的《四朝经籍志补》等。私人编制的藏书目录主要有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钱曾的《述古堂书目》,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还译进了大量科学著作。见于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著录的全国译著有 400 余种,其中属于江南学者翻译和出版的为数不少。如明时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表度说》等,达 10 种之多。清时上海“墨海书馆”一家就译印了《植物

学》、《代微积拾级》等自然科学图书多种。

学者们进行科学研究,需要参考大量图书,如徐光启撰《农政全书》一书,引用文献达 300 多种。学者们的科研成果也甚为丰富,仅梅文鼎一人的著述就达 80 多种。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私人刻书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该地区文艺创作也十分繁荣,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在明代,这里有长洲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即世人所谓的“三言”,乌程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即世人所谓的“二拍”,太仓王世贞的《鸣凤记》,山阴徐渭的《四声猿》,吴门沈璟的《红蕖记》,江西汤显祖的《牡丹亭》,仁和洪楸的《清平山堂话本》,闽建熊大木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和《北宋志传》,金陵许仲琳的《封神演义》,闽建余象斗的《大宋中兴岳王传》,昆山梁辰鱼的《浣纱记》。还有吴兴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吴中祝允明的《梅花诗》等书法作品,苏州唐寅的《震泽烟树图》等绘画作品,上海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以及新安、金陵、建安三派版画的大量作品等。清时,这里有影响的作品有:钱塘洪升的《长生殿》,吴兴陈沈的《水浒后传》,苏州沈德潜的《古诗源》,武进陈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丹徒刘鹗的《老残游记》,杭州陈端生的《再生缘》,常熟曾朴的《孽海花》,吴县朱素臣的《十五贯》,李玉清的《万里圆》,太仓吴伟业的《琵琶行》等,其作品数量又超越前代。阿英《晚清小说史》一书指出,晚清小说至少有 1000 种,其中属于江南地区创作和出版的不在少数。同时,其他文艺作品也很多,如这里仅李玉清一人就写剧本 60 多个,朱素臣写传奇 19 种。清时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数量也很多。《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著录的清季翻译的小说共 400 种,其中属于江南地区学者所译的就有半数之多,仅闽侯人林纾一人就译英、法等西方小说 167 种。林氏译书活动大多是在晚清进行的。

明、清时期这里文艺创作的繁荣,对当地私人刻书业的发展比

较有利。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酷好。”这些情况说明当时书坊刻印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很有市场。明、清时期，其他地区文艺创作也较繁荣，同样创作出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不胜枚举。因为当时江南地区书坊多，刻印技术精，其他地区学者也愿将其创作的作品送来这里刊印，如《聊斋志异》就是浙之鲍廷博代为刊印的。所以其他地区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对这里私人刻书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清后期该地区还创办出版了很多报刊，仅上海一地有名者就有《申报》、《六合丛谈》、《上海新报》、《新闻报》、《强学报》等10多种。此外杭州等地也创办报刊。这些刊物的创办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印刷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该地区私人藏书也很盛行，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藏书家。据吴晗《史略》统计，从古至清，浙江共有藏书家399人，其中明代有80人，清代有267人。以时代而言，浙之明、清两代私人藏书更盛于前代。贺修铭《康熙与清初的图书馆事业》一文认为，“清代的私人藏书家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并几乎为江浙所独占……黄虞稷是当时的主要代表”。明末毛晋“汲古阁”藏书84000册，中多善本，可谓既多且精。在明代，该地区还有叶盛、范钦、茅坤、祁承燦等人也堪称藏书大家，藏书多富特色。钱大昕称叶盛“藏书之富，甲于海内”。以地区而言，江浙藏书家之多远过于其他地区。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图书馆事业》一文指出，清代“藏书家大多为著名学者，尤为前代所未见”，并列表举例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表中所列的17人中有14人属于江南地区，他们是黄宗羲、全祖望、杭世骏等。藏书家多，所藏的文献就多，也就为这里私人刻书提供了大量的底本；藏书家多，收藏典籍的能力就大，同样为这里私人刻书提供了销售市场。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编辑丛书十分盛行，产生数以千计的丛